武漢大學學報【人文科学版】
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(Humanity Sciences)
第64卷 第3期 2011年5月
Vol. 64. No. 3 May 2011. 084～090

明代政坛南北之争与前七子的崛起

郭皓政

摘 要：明代前七子的崛起，是政坛南北之争在文学领域的集中反映。前七子矛头所指——台阁体和茶陵派，是南方文风的代表；前七子倡导的秦汉文风和盛唐诗风，则是对北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。此前，南方文人在明代政坛和文坛上一直占有绝对优势。前七子标榜汉、唐，含有为北方文化争胜的意味。前七子复古运动的沉寂，亦与北方政治势力的分化有关。对宋型文化的反省，是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重要价值所在。

关键词：南北之争；前七子；宋型文化；六朝文化

明代弘正年间，前七子在文坛迅速崛起。后人常用“文必秦汉”、“诗必盛唐”来概括前七子的文学主张。一个“必”字，既体现出前七子文学主张之鲜明，也隐含着对其文学观念狭隘之批判。其实，前七子的崛起，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和文化根源，它既受到明代政坛和科举考试中南北之争的直接影响，同时也是历史形成的南北人文差异的体现，不宜单纯地运用文学眼光加以观照。本文拟从地域文化的角度，对前七子崛起的原因及其倡导秦汉文风、盛唐诗风的用心略加申论。

一、中国南北人文差异及其对明代文学的影响

中国幅员辽阔，习惯上以长江为界，划分为南方和北方。历史上，南北既有统一时期，也经历过长期分裂的阶段，从而形成鲜明的南北人文差异。在考察古代文学的发展和流变时，对南北文风的辨析应多加留意。

元明之前，中国历史上强盛的大一统阶段，主要有秦、汉、隋、唐等朝代。宋代建国之初虽然也号称一统，但长期处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之下，国力与汉、唐已不可同日而语。至南宋，更是长期处于宋、金对峙的南北分裂阶段，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都大不如前。反映在文化上，主要体现为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心态。① 唐型文化的特点是开放、张扬，充满理想主义色彩。宋型文化的特点是保守、内敛，充满忧患意识，习惯于深思熟虑，以安身立命为首务，具有更加务实的态度。宋代以后，元、明、清数朝均为大一统的时代，但元朝和清朝处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，大部分国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态依然是保守、内敛的，近于宋型文化。明朝是汉人建立的大一统国家，不少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摆脱宋型文化束缚，再现汉、唐盛世风采的愿望，这便为明代文坛上复古思潮的流行奠定了基础。但是，历经宋、元两朝，宋型文化已根深蒂固，所以唐型文化与宋型

① 台湾历史学家傅乐成较早明确判分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。见傅乐成：《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》，原载《国立编译馆馆刊》第1卷第4期，1972年12月。后收入其《汉唐史论集》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。该文认为，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，宋代文化排拒外来文化，这是宋型文化与唐型文化最大的不同点；宋型文化是民族本位文化的代表。本文侧重于从政治角度分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的成因及特点，虽借用了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的称谓，但内涵有所不同。

文化的交锋，便成为明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景观。

以上是就时代而论。若就地域而言，则北方文化较倾向于唐型文化，南方文化较倾向于宋型文化。北方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。唐代以前的儒家文化，都把实现人的社会价值放在第一位。个体是社会的一部分，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。如果人的社会价值得不到充分实现，个体生命就是不圆满的。人的价值只有到社会中去实现，名垂青史、流芳百世成为人生的最高理想。因而，政治理想主义可视为是早期儒家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。而汉、唐盛世则为这种政治理想主义的生长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。唐代及其以前的几个大一统王朝，其政治、文化中心都在北方。秦朝建都于陕西咸阳，西汉和唐朝都定都于陕西的长安，东汉则定都于河南的洛阳。陕西（关右）、河南（中原）所受汉、唐文化影响之深，由此不难想见。前七子中，李梦阳出生于庆阳府安化县（今甘肃省庆城县，明代属陕西管辖），后迁居开封；康海是陕西武功（与咸阳相邻）人；王九思是陕西鄠县（今户县）人。以上三人均为陕西人。其余四人当中，何景明是河南信阳人；王廷相是潞州（今山西省长治市，与河南接壤）人；边贡是山东历城（今属山东省济南市）人；徐祯卿是常熟人，迁居吴县（今江苏省苏州市）。除徐祯卿外，前七子基本上都是北方人，且大多来自陕西和河南，他们倡导“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”，其中包含的弘扬乡土文化的意味不言自明。

前七子矛头所指，包括南朝文学，以及中唐以后的文学。而中唐之后的文学，尤以宋代文学最具代表性。宋代文学上承中晚唐之余绪，下启明代前期流行的以台阁体为代表的馆阁文风。南朝文学与宋代文学的共同特点，是政治理想主义的淡薄。南朝战乱频仍，盛行佛教，以审美追求取代政治热情，是当时文坛较为普遍的现象。宋代知识分子中，虽然也不乏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声音存在，但多数文人显然对寻求个体的安身立命之道更感兴趣。在政治理想破灭的时候，文人们依旧可以实现个体生命的圆满自足。所以，宋代理学也被称为“新儒学”，它与先秦儒家思想和汉代官方儒学不尽相同。

就地域而言，以追求审美和享乐为主要特征的南朝文化主要植根于南方，自不待言。特别是在以六朝古都南京及其附近的苏州为中心的吴文化区，直到明清时期，南朝文化留下的烙印依然清晰可辨。

宋型文化的中心也在南方，特别是江西地区，在宋代至明初的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就理学而言，宋代理学对后世影响最大者有濂、洛、关、闽四大学派。“宋兴，而周子崛起南服，二程子倡道伊洛之间，张子笃志力行关中，学者与洛人并。迨至朱子讲学闽中，集诸儒之成，而其传益广，于是世之言学者，未有不溯统于濂洛关闽。”①理学开山之祖周敦颐是道州营道（今湖南道县）人，长期在江西讲学，曾在江西九江莲花峰下开设濂溪书院，世称濂溪先生。闽学代表人物朱熹祖籍江西，长于福建，曾长期在江西为官、讲学。因之，江西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理学重镇。不过，在宋代理学的发展过程中，北方也有一些学派不容忽视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河南的洛学，以程颐、程颢为代表；陕西的关学，以张载为代表。张载提出以“气”为本的哲学观点，以及“民胞物与”的伦理思想，对明代前七子的文学主张有一定影响。

宋代文化史上，江西人才济济，如北宋的晏殊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、黄庭坚，南宋的杨万里、朱熹、陆九渊、文天祥等，都是江西人。其中，晏殊长期担任太平宰相，是宋初馆阁文人的典型代表；欧阳修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，彻底扭转了一代文风，影响至巨；黄庭坚影响下形成的江西诗派，成为宋诗的典型代表；朱熹则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。这些文化名人，为江西赢得了“文章节义之邦”的美誉。

在明代前期的政坛和科场上，江西同样引人瞩目。例如，明代首科状元吴伯宗便是江西人。此后，江西籍的状元、进士层出不穷。明人刘仕义《新知录摘抄》中有“吉安文物之盛”条，云：“江西一省可谓冠裳文物之盛，而吉安一府为尤最。自洪武辛亥至嘉靖己未，凡六十科，吉安进士七百八十八人，状元十一人，榜眼十一人，探花十人，会元八人，解元三十九人，登第者二十八人，官至内阁九人，一品六人，赠三人，尚书二十二人，赠四人，左右都御史六人，得谥二十五人。盛哉！”②刘仕义的统计是从明初到嘉靖年间。到了明代中期，江西在科举考试中便不再像以前那样风光了。成化二年（1466）之后直到明末的这一百七十余年间，江西只出了五名状元，其中吉安府只出过一名状元。

①张伯行：《濂洛关闽书》原序，载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第0617册，商务印书馆1937年，卷首第2页。
②刘仕义：《新知录摘抄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，第72～73页。

下面,我们再来考察一下明代前期文坛的情况。明人胡应麟《诗薮》云:"国初闻人,率由越产,如宋子濂、王子充、刘伯温、方希古、苏平仲、张孟兼、唐处敬辈,诸方无抗衡者。而诗人则出吴中,高、杨、张、徐、贝琼、袁凯亦皆雄视海内。至弘、正间,中原、关右始盛;嘉、隆后,复自北而南矣。"①这段话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明代文学地图。可以看出,整个明代,只有在前、后七子倡导复古运动的时期,北方文人才一度崭露头角,而其余的大部分时期内,南方文人一直在文坛上占有绝对优势。胡应麟将明初诗坛分为五派,包括吴诗派、越诗派、闽诗派、岭南诗派、江右诗派。② 这五大诗派全部位于南方。其中,尤以吴中为盛。吴中文学的兴盛始于元末。元末群雄割据,吴中乃张士诚的势力范围。这里物产富庶,政局相对稳定,加上张士诚优待文人,许多有个性的文人都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。例如,元末最具艺术个性的诗人杨维桢便生活在吴中地区;高启、袁凯等年轻诗人在元末吴中文坛上名气也比较响亮。由于张士诚在吴中比较得人心,明朝建国后,朱元璋便将吴中文人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,吴中诗坛一度沉寂。永乐之后,明代文坛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台阁体。其代表作家"三杨",杨士奇是江西泰和人,杨荣是福建建安人,杨溥是湖广石首人。其中,杨士奇的文学成就最高,其成就主要体现在散文方面,他继承了欧阳修、曾巩等人的文风,形成了一种既典雅又实用的台阁文风。除杨士奇外,永乐时期的馆阁文人中,江西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,如解缙、胡广、曾棨、金幼孜等都是江西人。成化以后,台阁体被茶陵派取代。茶陵派的领袖李东阳是湖南茶陵人,其成员则以来自吴地的文人居多。与台阁体相比,茶陵派更关注文学的审美价值,他们将台阁气与山林气结合起来,刻意追求一种翰苑风流。茶陵派的活动中心虽然在北京,但其成员以南方人为主,其文风和诗风也带有鲜明的南方文化色彩。

综上所述,明朝开国以来,文坛长期处于南方文人的掌控之中。以江西地区为代表的宋型文化和以吴中地区为代表的南朝文化,轮番占据着文坛的主流。北方由于在历史上战乱频仍,特别是曾经长期处于金、元等异族统治之下,文化水平相对落后。但是,北方文化亦有其长处。无论在学术思想还是文学方面,北方文化传统都足以与南方文化传统相抗衡。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休养生息之后,北方文化逐渐复苏。至弘治时期,前七子先后考中进士,开始在文坛大放异彩。他们大力倡导复古运动,明显带有为北方文化争胜的意味。

二、明代前期政坛的南北之争与前七子的崛起

明代前期,政坛和文坛一直是南人的天下,但北人的政治势力也在不断壮大。至成化、弘治年间,北人的政治势力已能够与南人相抗衡。弘治年间,前七子的崛起,与政坛的南北之争紧密相关。下面,我们就从科举着眼,分析一下明代政坛南北之争的起因,及其对前七子复古运动的影响。

明代政坛南北之争的根源,可追溯至南宋。南宋时期,历经长期宋、金对峙,北方无论在文学还是理学方面,都较南方要落后许多。元代统一中国之后,在科举考试中实行南北分榜而试,蒙古人、色目人为一榜,称为左榜;汉人、南人为一榜,称为右榜。两榜进士的考试科目、答题要求都不相同,"蒙易汉难"。这主要是为了维护少数民族对汉族的统治,同时也是出于对南北文化差距的现实考虑。

明代科举取消了南北分榜而试,南北文化水平的差距也随之凸显。明初,取士不分南北,一视同仁。如此一来,南方士人在科举考试中便占据了绝对优势。洪武三十年(1397)的丁丑科会试,甚至出现了中进士者全部为南方士人,北方士人无一被录取的情况。③ 这次科举考试提醒了明代统治者重视南北地域文化的差距。此后,科举考试开始注意适当录取北方士人,但直到永乐年间,并未对南北取士比例做出明确规定。所以,南方人在科举考试中依然占有很大优势。特别是江西,在明代前期的科举考试中,

①胡应麟:《诗薮》续编卷一,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,第341页。

②《诗薮》续编卷一,第342页。

③洪武三十年(1397)丁丑科会试主考官刘三吾、白信蹈等都是南方人。放榜之后,有落第的北方士子鼓噪不平,认为考官偏私南方人。明太祖朱元璋令翰林院侍读张信等覆阅试卷,张信等认为原先的阅卷结果是公平的。刘三吾、白信蹈、张信等人只着眼于试卷本身文字的高下,没有考虑到实际的政治需要,没有体会到朱元璋打算通过覆阅试卷调和南北矛盾的良苦用心。结果,白信蹈、张信等被处死,刘三吾遭流戍。朱元璋亲自阅卷,从落榜进士中录取了六十一人,全部为北方人。所以,是科进士有两榜,史称"南北榜"。

一直处于绝对领先地位。

洪熙元年(1425)，开始就南北取士名额作出明确规定。《明史》载："洪熙元年，仁宗命杨士奇等定取士之额，南人十六，北人十四。宣德、正统间，分为南、北、中卷，以百人为率，则南取五十五名，北取三十五名，中取十名。"①虽然北方录取名额依然少于南方，但在北方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，毕竟保证了北方士人有被录取的机会，所以上述规定还是有利于北方的。

正统年间，明英宗朱祁镇喜北人，对南人则抱有戒心。这从《明史》的两处记载中可见一斑。一是关于王翱的记载。王翱是河北人，官至吏部尚书，深得英宗敬重，英宗复辟后，召对便殿，只称先生而不呼其名。《明史》载："王翱性不喜南士。英宗尝言：'北人文雅不及南人，顾质直雄伟，缓急当得力。'翱由是益多引北人。"②英宗认为，北方人虽然在文学方面比不上南方人，但遇事敢于承担，能够为国家效力。王翱为官正直，他极力引荐北方人，不是为了结党营私，而是出于对当时官场上圆滑世故不良风气的深恶痛绝。二是关于彭时的记载。彭时是江西人，正统年间由英宗亲点为状元，深受英宗宠信。"帝爱时风度，选庶吉士，命贤尽用北人，南人必若时者方可。"③天顺四年(1460)会试后，选拔庶吉士，英宗命李贤多用北方人，南方人只有如彭时者方可录用。李贤是河南人，为明代名臣。他将英宗的这番话转告给彭时，彭时误以为李贤有意压制南方人，愤愤不平。这一年选拔的十五名庶吉士中，仅有六名是南方人，北方人第一次在庶吉士选拔中占据了上风。被选为庶吉士，就有机会留在翰林院并最终进入内阁。河南人刘健就是在这一年被选为庶吉士，弘治年间官至内阁首辅，成为一代名臣。刘健对前七子的崛起有直接影响，下文还会提及此人。

与英宗朱祁镇相比，其弟代宗朱祁钰则更偏向于任用南方文人。景泰初，朝廷一度废止有关取士名额的规定。给事中李侃、刑部侍郎罗绮等上书极力反对，指责"部臣欲专以文词，多取南人"④。但未被采纳。直到景泰五年(1454)甲戌科考试，方依给事中徐廷章的建议，恢复正统间的旧例，会试中分南、北、中卷录取。其中，南卷包括应天及苏、松诸府，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湖广、广东。北卷包括顺天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陕西。中卷包括四川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及凤阳、庐州二府，滁、徐、和三州。

天顺八年(1464)，明宪宗朱见深即位，次年改年号为成化。天顺、成化年间，政坛和科举考试中的南北之争亦十分激烈。成化十四年(1478)，万安升任内阁首辅，与另一位内阁大学士刘珝之间争权夺利。《明史》称："安无学术，既柄用，惟日事请托，结诸阉为内援。"⑤"而安为首辅，与南人相党附，珝与尚书尹旻、王越又以北人为党，互相倾轧。然珝疏浅而安深鸷，故珝卒不能胜安。"⑥万安是四川眉州人，四川在明代科举考试中属于中部地区，进士名额较少，为壮大自己的政治势力，万安一方面与南方人结党，另一方面想方设法扩大中部地区的录取名额。成化二十二年起，从南北取士名额中各减二名，增加到中部。

成化二十三年(1487)，明孝宗登基，次年改元弘治。明孝宗是一位明君，即位不久，便将万安罢黜，而科举考试的名额分配也恢复到正统间的旧例。"弘治二年复从旧制。嗣后相沿不改。"⑦孝宗统治时期，政治清明，史称"弘治中兴"。这一时期，刘健、李东阳、谢迁等名臣先后进入内阁。

弘治十二年(1499)，刘健升任内阁首辅，其次为李东阳、谢迁。刘健任事刚果，李东阳长于文学，而谢迁见事明敏、持论谔谔，与之相济。时人语曰："李公谋，刘公断，谢公尤侃侃。"⑧天下共称贤相。这一内阁的"金三角"结构一直维持到正德元年(1506)。三人之间虽然没有爆发过直接的矛盾冲突，但是，南北人文差异的存在，使他们彼此之间也不无微词。

关于南北人文差异，林语堂有过一段生动的描绘，他说："北方的中国人，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，……他们是自然之子。……在东南边疆，长江以南，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：他们习惯于安

①《明史》卷七十《志第四十六·选举二》，中华书局 1974 年，第 1697 页。
②《明史》卷一七七《列传第六十五·王翱》，第 4702 页。
③《明史》卷一七六《列传第六十四·彭时》，第 4683 页。
④《明史》卷七十《志第四十六·选举二》，第 1697 页。
⑤《明史》卷一百六十八《列传第五十六·万安》，第 4523 页。
⑥《明史》卷一百六十八《列传第五十六·万安》，第 4524 页。
⑦《明史》卷七十《志第四十六·选举二》，第 1698 页。
⑧《明史》卷一百八十一《列传第六十九·谢迁》，第 4819 页。

逸,勤于修养,老于世故,头脑发达,身体退化,喜爱诗歌,喜欢舒适。"①林语堂对北方人统而论之,而将南方人划分为几种类型。文中所指乃是江浙一带的人。李东阳虽然是湖南人,但他与吴中文人交往密切。将这段评论套用在刘健和李东阳身上,是再恰当不过了。

刘健是河南洛阳人,深得河东大儒薛瑄真传。《明史》称:"健学问深粹,正色敢言,以身任天下之重。"②"东阳以诗文引后进,海内士皆抵掌谈文学,健若不闻,独教人治经穷理。其事业光明俊伟,明世辅臣鲜有比者。"③他身上典型地体现出北方人的耿直、质朴。

李东阳政治地位居于刘健之下,但他自幼便以神童的身份进入翰林院,在翰林院中长大,在馆阁文人中享有极高的声望,是当时的文坛领袖。《明史》称:"弘治时,宰相李东阳主文柄,天下翕然宗之。"④何良俊《四友斋丛说》载:"李文正当国时,每日朝罢,则门生群集其家,皆海内名流,其座上常满,殆无虚日,谈文讲艺,绝口不及势利,其文章亦足领袖一时。正恐兴事建功或自有人。"⑤从何良俊最后一句话看,他对李东阳也不无微词,认为李东阳身为朝廷重臣,沉溺于文艺,没有尽到"兴事建功"的责任。

刘健与李东阳的性格、兴趣不同,也影响到他们的用人态度。刘健不喜南人的圆滑世故。所以当谢迁极力推荐刘东阳的好友、茶陵派成员吴宽入阁时,刘健坚决不同意。吴宽是苏州人,以文学见长,在翰林院期间,每日公退之余,吟花弄草,若不知有官者。王鏊《姑苏志》称其"为人静重醇实,自少至老,人不见其过举,不为慷慨激烈之行"⑥,这样的人物,自然得不到刘健的喜欢。同样,李东阳与吴中文人兴趣相投,与北方人则格格不入。《四友斋丛说》称:"李西涯长于诗文,力以主张斯道为己任。后进有文者,如汪石潭、邵二泉、钱鹤滩、顾东江、储柴墟、何燕泉辈,皆出其门。独李空同、康浒西、何大复、徐昌谷自立门户,不为其所牢笼,而诸人在仕路亦遂偃蹇不达。"⑦其中,受李东阳提携者多为南方人,而前七子因为与李东阳的文学主张不同,在仕途上始终得不到重用。

刘健虽然身为首辅,地位在李东阳之上,但李东阳交游广阔,门生众多,当时的翰林院基本上为李东阳所把持。明代翰林制度是科举制度的延伸,有"非进士不入翰林,非翰林不入内阁"⑧之说。翰林院是南人的天下,就意味着未来的内阁,依然由南人把持。翰林院已经成为一个盛产官僚的机构,要彻底改变明代政治环境,必须打破馆阁文人自命风雅的传统。

"弘治中兴",时代向前七子发出了难以抗拒的召唤;刘健执政,为前七子提供了有力的政治靠山。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,前七子应运而生。从弘治六年(1493)到弘治十八年(1505),前七子先后登上政治舞台。他们以诗文为武器,向李东阳为代表的馆阁文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。

前七子中,最先登上政治舞台的是李梦阳。弘治五年(1492),李梦阳二十一岁,举陕西乡试第一,弘治六年(1493)中进士,是科会试主考官为李东阳。李梦阳会试后没有立即做官,因连丧父母,在家守制。直到弘治十一年(1498),方出任户部主事,后迁郎中。王九思、边贡是弘治九年(1496)进士。王九思被选为庶吉士,后授翰林院检讨。边贡年方二十,未入选庶吉士,初授太常博士,迁兵科给事中。康海、王廷相、何景明三人是弘治十五年(1502)进士。是科会试主考官吴宽乃李东阳好友,为茶陵派成员。康海高中是科状元,授翰林院修撰。王廷相被选为庶吉士,入翰林院进修,但未能留在翰林院,两年后出任兵部给事中。何景明年方十九,未能入选庶吉士,授中书舍人。徐祯卿是弘治十八年(1505)进士,他本来是吴中四才子之一,在进士考试中名次居前,但因貌丑,无缘进入翰林院。

前七子个个才华横溢,在北方进士录取名额较少的情况下,他们能够脱颖而出,年纪轻轻就考中进士,且名次均比较靠前,实属难能可贵。但他们却难以融入主要由南方人把持的馆阁文人圈。前七子中,只有康海和王九思具有馆阁文人的身份。王廷相虽然被选为庶吉士,但只是在翰林院进修,未能留

①林语堂:《中国人》,学林出版社 1994 年,第 31~32 页。
②《明史》卷一百八十一《列传第六十九·刘健》,第 4810 页。
③《明史》卷一百八十一《列传第六十九·刘健》,第 4817 页。
④《明史》卷二百八十六《列传第一百七十四·文苑二》,第 7347 页。
⑤何良俊:《四友斋丛说》卷八,中华书局 1959 年,第 67 页。
⑥王 鏊:《姑苏志》卷五十二,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
⑦《四友斋丛说》卷十五,第 127 页。
⑧《明史》卷七十《志第四十六·选举二》,第 1702 页。

在翰林院中供职，故不能称为馆阁文人。前七子中的其他几名成员，也都与翰林院无缘。虽然当时的馆阁领袖李东阳、吴宽在名义上是前七子的座师，但政坛上长期以来形成的南北之争，以及文坛上南北文风的差异，使前七子与馆阁文人格格不入。只要馆阁文风得不到改革，北方士子在仕途上就会受到歧视，难有出头之日。前七子认识到这一点，于是他们向馆阁文人发出挑战。此前，人们对北方士人的印象是质实少文。前七子的出现，扭转了人们的这一印象。他们努力向世人证明，北方人不但思想上正直果敢，在文学上也不亚于南方人。馆阁文人虽然以风雅自命，但继承的文学传统不过是迂腐呆板的宋型文化，或者“绮丽不足珍”的南朝文化。前七子提醒世人，只有代表北方文学传统的秦汉之文、盛唐之诗，才是真正的大雅之道。

康海在前七子复古运动中一直是非常活跃的角色。前七子在文坛真正形成声势，应当从康海中进士的那一年，即弘治十五年(1502)算起。在此之前，李梦阳、王九思、边贡虽然已经考中进士，但还没有正式擎起复古运动的大旗。弘治十五年，康海夺得状元，王廷相、何景明也考中进士，复古运动的声势才真正壮大起来。康海与王九思作为翰林院官员，从馆阁文人内部向台阁体和茶陵派发出正面挑战，其影响和作用更加值得重视。李梦阳、何景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诗歌方面，他们以提倡“诗必盛唐”而闻名，这一观点其实依然是延续了李东阳的格调说，不过是更加激进一些而已。而康海在散文方面颇有建树，是“文必秦汉”说的代表，其矛头直指当时平庸无奇的台阁体文风。可以说康海是真正抓住了馆阁文学的要害，其革命色彩更加鲜明。康海作为状元和馆阁文人，在前七子中前途最为远大，其政治斗争的目标也十分明确。他在翰林院任职期间，常常说：“南北人才之用舍，天下治乱之所关也。”①正德三年(1508)，康海为会试同考官，力推陕西高陵人吕柟为第一。吕柟以理学闻名于世，世称泾野先生。主考官内阁大学士王鏊是南方人，将吕柟置之第六。会试发榜后，康海扬言：“吕仲木天下士也。场中文卷无可与并者。今乃以南北之私，忘天下之公。蔽贤之罪，谁则当之？会试若能屈吕矣，能屈其廷试乎？”②王鏊闻言十分恼怒。廷试时，吕柟果然高中状元，王鏊又不得不佩服康海的眼光。

前七子的崛起，可以说是得天时(弘治中兴)、地利(北方文化传统)、人和(刘健执政)之便。他们提出“文必秦汉、诗必盛唐”的口号，有着现实的政治意义。如果单就文学而言，南北文风其实各有所长。只有结合明前期政坛的南北之争来考察前七子倡导的复古运动，我们才能够体会前七子提出“文必秦汉、诗必盛唐”口号的真实用意。

三、前七子复古运动的消沉及其影响

前七子复古运动声势最大的时期，是从弘治十五年(1502)至弘治十八年(1505)。正德年间，复古运动迅速走向消沉。其原因，一是刘健辞官，前七子失去了政治上的最大靠山；二是刘瑾当权，北方政治势力被抹黑；三是李东阳成为首辅，南方政治势力在道义上占据了上风。

弘治十八年(1505)，孝宗去世，武宗继位。武宗年少，贪于玩乐，宠信太监，朝政大权遂落入太监刘瑾之手。刘健屡次上疏力谏，希望武宗勤政，武宗不听。刘健等遂密谋除掉刘瑾，事泄，刘健、谢迁相继引官归里，李东阳独留。刘健、谢迁离京之时，东阳为他们饯行，泣下。“健正色曰：‘何泣为？使当日力争，与我辈同去矣。’东阳默然。”③刘健的刚直不阿与李东阳的圆滑世故，与太监刘瑾的政治斗争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刘健辞官后，李东阳继任内阁首辅，吴中文人王鏊、河南人焦芳入阁与其共事。焦芳与刘瑾勾结，王鏊不久亦辞官归里，李东阳委曲求全，至正德七年(1512)始以老病乞休，又四年后卒。《明史》评论道：“有明贤宰辅，自三杨外，前有彭、商，后称刘、谢，庶乎以道事君者欤。李东阳以依违蒙诟，然善类赖以扶持，所全不少。大臣同国休戚，非可以决去为高，远蹈为洁，顾其志何如耳。”④对刘健、谢迁作了高度赞扬，对李东阳也表示同情，认为他虽然“依违蒙诟”，但内心深处还是正直的。

---

①张治道：《翰林院修撰对山康先生状》，载黄宗羲：《明文海》卷四三三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
②《翰林院修撰对山康先生状》。
③《明史》卷一百八十一《列传第六十九·李东阳》，第4822页。
④《明史》卷一百八十一《列传第六十九》，第4829页。

刘健的归隐,对前七子倡导的复古运动而言是一次沉重打击。而刘瑾、焦芳结党营私、败坏朝纲,给北方人抹黑,也使前七子的复古运动失去了政治理想主义的光彩。正德年间,刘瑾、焦芳等人内外勾结,把持朝政。刘瑾是陕西人,焦芳是河南人,虽然朝中的当权者与前七子同为北方人,但"道不同不相为谋",前七子与其势同水火。如果说前七子与李东阳之间是由南北人文差异导致的矛盾,那么前七子与刘瑾、焦芳之间则是不同政治立场的斗争。同时,刘瑾要借重李东阳的名望,对李东阳礼敬有加,因此前七子在政治上依然受到李东阳的压制。在道义上,南方士人也占据了上风。由于政局的变化,北方政治势力内部出现分化,南北之争让位于忠奸之争,复古运动失去了最初的政治动力,逐渐走向消沉。

正德年间,刘瑾、焦芳对康海十分看重,借同乡之谊,极力拉拢康海,但康海对其不屑一顾。直到李梦阳下狱论死,康海才不顾自己名节受损,屈就刘瑾。刘瑾垮台后,康海、王九思俱受牵连,罢官还乡,终身不复录用。因而,后世论前七子,多以李梦阳、何景明为代表人物。少了康海这员主将,前七子复古运动最终沦为单纯的文学论争,而不再具有政治批判色彩了。脱离了南北之争的政治背景后,"文必秦汉,诗必盛唐"的口号便显得过于偏激,给世人留下了许多指摘的口实。所以,正德年间,前七子倡导的复古运动其实已经是徒有其表。

从正德八年(1513)到嘉靖初,李东阳致仕后,杨廷和继任内阁首辅。杨廷和是四川新都人,在明代科举考试中,四川即不属于南方,也不属于北方,被视为是中部地区。但杨廷和在政治立场上是接近于李东阳的。杨廷和执政期间,他的弟弟曾经去拜访过康海,暗示康海可以出来做官,遭到了康海的拒绝。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十四岁时拜李东阳为师,于正德六年(1511)考取状元,在翰林院任职。杨慎以博学而著称,其诗主要学习六朝。他对前七子多有批评。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指出:"用修乃沉酣六朝,揽采晚唐,创为渊博靡丽之词,其意欲压倒李、何,为茶陵派别张壁垒,不与角胜口舌间也。"①杨慎以自己出色的诗歌创作,打破了"诗必盛唐"的神话。

散文方面,嘉靖间,京城有"嘉靖八才子"出现,其中王慎中、唐顺之以及后来的茅坤、归有光等人大力倡导唐宋文风,可视为对前七子"文必秦汉"主张的反拨。"嘉靖八才子"及唐宋派成员当中,南、北、中部人都有,他们对前七子的反拨完全是从文学立场出发,不含任何地域观念和政治色彩。

嘉靖、隆庆年间,又有后七子倡导的复古运动兴起。后七子成员中,李攀龙是山东人,王世贞是江苏人,谢榛是山东人,宗臣是兴化(今属江苏)人,梁有誉是广东人,徐中行是长兴(今属浙江)人,吴国伦是湖北人。他们对"文必秦汉、诗必盛唐"的提倡,不像前七子那样具有鲜明的地域观念和政治色彩。

晚明的一些文学社团,如复社、几社等,倡导"尊经复古",对前七子极为推崇。复社由十几个社团联合而成,包括浙西闻社、江北南社、江西则社、吴门匡社、中州端社、莱阳邑社、浙东超社、浙西庄社、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等等,其地不分南北。几社在松江,属于吴中地区。所以,晚明的复古运动,也与南北之争无关。但是复社、几社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,其成员多为青年士子,他们相互砥砺,希望能够在仕途方面有所建树,改变晚明黑暗的社会现实。在这方面,他们与前七子倡导复古运动之初的动机颇有相似之处。

总之,考察前七子倡导的复古运动,视野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学范围内,还应对其政治意图多加留意。前七子的复古运动,与青春的激情、崇高的理想密不可分,是对沉闷污浊的政治空气和妥协退让、明哲保身、得过且过的乡愿哲学的反抗,是对唐之后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至深的宋型文化的深刻反省。或许,这才是前七子复古运动的真正价值所在。

●**作者简介**:郭皓政,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,文学博士;海南 海口 571158。

●**责任编辑**:何坤翁

◆

①钱谦益: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丙集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9 年,第 354 页。